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料

华北治安战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

(上)

天津人民出版社

华北治安战

(上)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 编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华北治安战
(上)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 编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 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5 1/8 插页 1 字数330,000

一九八二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八二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3500

统一书号：5072·3

定 价：1.42元

(内部发行)

译者说明

《华北治安战》是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的一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华北的作战史。本书比较详细地记叙了当时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所采取的各种战略、战术，及其遭到强烈抵抗的情况。

按照日本帝国主义者制订的“国策”，在侵占我国东北之后，迫切需要使华北成为它的战略根据地，以便最后鲸吞中国。“华北治安战”即为达到此目的而进行的。早在“七七”事变以前，日本即不断以武力威胁国民党反动政府使之屈服，相继签订了“塘沽”、“何梅”、“秦土”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同时，派遣特务机关收买亲日分子策动华北独立。敌人的猖狂侵略激起我国人民的极度义愤，终于爆发了空前规模的中日战争。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仰仗其精锐强大的兵力，利用国民党反动政府“攘外必先安内”，假抗日、真反共的政策，妄想一举而定华北。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粉碎了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使侵略者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本书除系统地叙述了中日战争在华北各个阶段的作战经过外，并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斗争介绍颇详。诸如“百团大战”，冀东、冀中（包括“五一扫荡”）、

冀南、晋南、晋中、鲁西等地的所谓“肃正作战”，先后五次的“治安强化运动”，对华北、华中、南京一系列伪政权的炮制和操纵，以及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诱降活动等等，都有比较具体的记载。另一方面，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群众工作和游击战术，以及敌人采取的各种谋略、战术等也作了分析和研究。书中一再确认：“华北治安的症结所在，并非国民党政府，而是中共。”并且以大量事实说明“中共游击战和地下工作异常巧妙，”使敌人打了一场“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没有明确战线的战争”，“陷在泥潭里的浴血战争”。据日本军方透露，至1940年，“日军在华北有九个师团和十二个旅团的强大兵力被钉死在那里”。这样，就大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国力，牵制了日本的兵力，从而导致日本侵略者的“整个战局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

本书原文共两卷，上卷自“九·一八”事变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止，下卷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至日本无条件投降止。本书编写的内容主要依据日本侵华时的档案资料，大本营和陆军省的机密文件、日志和颁发的命令，以及当时日本的主要决策者、高级指挥官等的回忆和笔记。因此，本书编写的立场、观点，当然站在与我敌对的方面，其采用的资料不可避免地要带有侵略者的偏见，其真实程度，特别是书中列举的“战况”及“战果”，是根据当时日本当局发表的作战公报编写的，连日本人也认为“大本营发表的统计数字相当可观，但其中70%是为了夸耀战果而增加的水分”（见《土肥原贤二秘录》）。尽管如此，本书还是得出了“中共是致命的祸患”，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结论。因而本书从另一个

角度看来，仍有其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这一点，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中日战争中敌我双方采取的战略战术，敌人如何利用蒋介石、汪精卫等执行的投降卖国路线，以及战争成败的各种因素，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为全书的上卷，其中资料颇多烦琐重复之处，另外，有些地方引用早经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文件等，译时大部从略。至于敌人当时搜集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八路军以及国民党等的情报，其内容和人名、职称、番号、军政机关序列以及对国共关系的介绍等等，多有错误和主观猜测之处，为保持原著的面貌，便于研究当时敌人的活动情况及心理状态，均按原文译出，未加订正。此点希望读者特别予以注意。另外，有些专用名词，如“治安战”、“肃正”、“剔抉战术”等等，因系当时日军特定用语，故均用原文，从行文中当可了解其含义。有些地方译者作了注解。至于书中的“笔者注”、“注”以及括号内的说明，均为原书编者及作者所加，也希读者注意。

全书由田琪之、申泽福、李直、方克、宣继哲、张玉璞、王新崇、尹福泽等同志译出，孙立民同志负责校订。李作民、张士杰同志也做了部分校订工作。

最后，限于译者水平，难免翻译错误或不当之处，诚恳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

目 录

译者说明.....(1)

序章 华北事变爆发前的形势

——日、中在华北的对立.....(1)

满洲事变后的形势.....(1)

华北自治工作的进展.....(6)

纠纷不断发生.....(13)

绥远事件及西安事变.....(15)

华北形势恶化.....(17)

第一章 从华北事变至1938年的治安战.....(19)

一 从华北事变向中国事变发展.....(19)

华北事变的爆发

中国事变趋向扩大

华北方面地面作战概要

八路军的出动

平型关战斗

二 1937年华北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48)

华北政权建立工作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蒙疆三自治政府的成立

1937年末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

华北方面军对占领地区维持治安的指导

三 事变的扩大化及1938年的治安状况.....(73)

徐州会战及华北占领地区的治安

攻取武汉战役及华北的治安肃正

四	中共的政治工作	(83)
	中共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建设	
	边区政府组织机构——晋察冀边区政府	
	扩大党组织工作的实况——和顺县的一例	
	中共党组织的扩充及后方扰乱工作	
	共军的政治工作	
	中共的军事工作	
第二章	1939年度的治安战	(107)
一	华北方面军的治安肃正计划	(107)
	确保安定的基本设想	
	治安肃正的根本方针	
二	肃正作战与治安工作概要	(110)
	要点	
	第一期肃正作战(1939年1月—5月)	
	第二期肃正作战(1939年6月—9月)	
	第三期肃正作战(1939年10月—1940年3月)	
三	各方面的肃正作战	(128)
	五台作战(1939年5月8日—6月25日)	
	鲁南作战(1939年6月7日—6月25日)	
	鲁西作战(1939年7月3日—7月9日)	
	驻蒙军及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肃正讨伐	
	第一一〇师团地区的治安肃正	
四	中共各项工作实施状况	(164)
	文教(思想)工作	
	宣传工作	
	经济工作	
	对抗属的优待工作	
	除奸工作及民众连坐法	
	制造、修理枪械等工作	
	山西省西北部的叛乱工作(晋西事件)	
	对日军的思想工作情况	
五	方面军对中共情报的收集	(176)

方面军情报工作负责人会议

驻中国宪兵队的情报业务

华北灭共委员会

六 华北、蒙疆的政情(188)

树立临时政府中央政权的准备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

新民会的活动

天津租界问题

七 中国方面的状况(197)

国民政府(蒋政权)的抗战态势

中共的动向

国共矛盾的激化

第三章 1940年度的治安战(205)

一 根据全面形势的剧变所采取的各项施策(205)

针对国际形势发展制订应付时局的措施

促进汪蒋合流工作

国共走向妥协的努力及双方的交涉

二 华北方面军关于肃正工作的施策(216)

1940年春中国军和地方治安状况

1940年度肃正工作的根本方针

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计划

方面军对思想战的指导方案

关于确立秩序的军律布告

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与新民会的改组

三 各方面的治安肃正工作(263)

山西省南部的肃正作战

第三十七师团地区的警备及治安情况

第三十六师团地区的警备及治安情况

山西西北部的肃正作战(1940年6月6日—7月8日)

冀中、冀南及山东的肃正作战

第三十二师团地区的警备与治安情况

第二十七师团地区的警备与治安情况

	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的治安肃正工作	
四	中共在华北的政治工作及军事方针	(283)
	政治工作的重点	
	行政组织与民众组织	
	中共地下工作的一例	
	八路军的行动方针	
五	对“百团大战”的作战（冀中作战、 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	(291)
	共军攻势开始前的一般情况	
	共军第一次攻势与日军的防御战斗	
	第一期晋中作战（第一次反击作战）（1940年8月30日—9月18日）	
	共军的第二次攻势（1940年9月22日—10月2日）	
	第二期晋中作战（1940年10月11日—12月3日）	
	晋察冀边区方面的肃正作战	
	从中共方面的记录看“百团大战”	
六	从“百团大战”中取得的教训和对中共的观察	(326)
	第一线兵团取得的教训	
	共军方面取得的战斗教训	
	华北方面军加强和调整情报机能	
	方面军对中共的观察	
	方面军对国共矛盾的观察（1941年1月—3月）	
七	华北方面军第二期后段的肃正建设	(350)
	中共势力的盛衰及华北治安的好转	
	年初华北方面一般敌情	
第四章	1941年度的治安战	(357)
一	指导对华长期战的各项措施	(357)
	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	
二	1941年初期华北方面军的肃正建设	(361)
	方面军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	
	冀东作战与冀中北部作战	
	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展开（3月30日—4月3日）	
三	对华北地区共党实力的观察	(376)

	中国共产党组织系统概况	
	晋察冀边区政府的组织概况	
	第十八集团军管下各军区概况	
	对共军战斗力的观察	
	剿共工作的参考	
四	1941年夏季的各项主要施策	(411)
	肃正建设三年计划	
	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推进和扩大	
	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	
	方面军的作战计划	
	作战经过概要	
	政治及宣传报道工作	
	教训及意见	
五	1941年秋季各项施策的推进	(449)
	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	
	中共方面的“治安强化运动”对策	
	肃正作战及其成果	
	沁河作战（9月20日—10月20日）	
	博西作战（“は”号作战—9月19日至10月1日）	
	第二次鲁南作战（“ろ”号作战—11月5日至12月28日）	
	第一一〇师团地区内的肃正建设工作	
	讨伐肃正作战的成果	

序章 华北事变^①爆发前的形势

——日、中在华北的对立

满洲事变^②后的形势

日本虽于1932年9月15日承认了满洲国^③，但满洲国内治安状况仍很混乱，需要军方用极大努力进行肃正讨伐。关东军于年末扫荡了呼伦贝尔进入满洲里，1933年平定了热河省，断绝了张学良政权赖以扰乱满洲的根源。

此次热河作战，趁势越过长城线而到达华北地区，5月31日，关东军与当地中国军之间在塘沽缔结了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关东军8月由长城线撤军，熄灭了日中之间在华北的战火。根据这一协定，划定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一线以东，北至长城地区，为非武装地带，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维持治

① 日本侵略者最初称“七七事变”为“华北事变”，后又改称“中国事变”，后同。——译者

② 日本侵略者称“九一八事变”为“满洲事变”，后同。——译者

③ “满洲国”即1932年2月18日，在日本侵略者一手操纵下成立的东北傀儡政权。——译者

安。

由此，关东军专心致力于恢复全满的治安，分散部署各兵团，积极展开讨伐作战。

中国方面于6月17日，成立了以黄郛为委员长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及北平、青岛两市为管辖区，处理华北政务。但该委员会软弱无能，对于处理与当地日军及外交官员之间的悬案毫无进展。

本章仅就1937年7月至华北事变爆发期间的形势，特别是对于日本进入华北的情况，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所持的态度以及相互关系加以概述。

日本基于1932年日满议定书，实际上全面担任了防苏重点的满洲国的国防，急于充实国防力量使之空前强大，并改革军制。但远东的苏联战备急剧扩展，在1933年间，已完全打破了日苏之间的均衡状态。

关东军痛感对苏国防的危险，但正处于讨匪几无宁日的情况下，致使对苏战备迟延。然而，在这期间，以满洲对抗苏联为背景，笼络内蒙、华北使之与我方采取同一步调的谋略工作，却有迅速的进展。

对内蒙，则策动新兴势力的领导者德王。1935年5月，参谋副长板垣征四郎少将在东乌珠穆沁王府会见德王以后，迅速推进了内蒙的工作。

对华北，由于与南满的治安、经济关系密切，又因在对苏防卫上具有巩固满洲后方的意义，故对之抱有深切的关心。无奈兵力不足，对华北、内蒙只能依靠政治谋略。

塘沽协定后，日中之间逐渐平静。在1934年12月，蒋介石也采取了对日绥靖的新外交政策，恢复了满洲与华北之间的交通、通信、邮政等，形势顿见好转。但另一方面，围绕塘沽协定的实施，纠纷频出，不仅在停战地区内发生扰乱治安的情况，并波及该地区以外。

兹将当时中国的一般形势加以概述。

满洲事变爆发以来，在中国群众之间，民族意识、国民觉悟空前急剧高涨，出现了通过南京政府实现全国统一的强烈要求。1932年1月1日，南京、广东两政府合并成立了统一政府。林森任政府主席，出现了行政院长汪兆铭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合作的新时代。蒋介石支持汪兆铭的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方针，对日持慎重态度。

1932年1月末，因第十九路军爆发了上海事变^①，5月停战。于是，蒋介石为完成国内的统一，再次恢复剿共作战，即第四次围剿，由蒋自任剿共总司令，在汉口设立总司令部，动员60万人的兵力，在6至10月之间，进攻以湖北为中心的三省苏区。

此次剿共作战值得注意之点，是以县为单位组织义勇军，建设公路，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等。根据过去的经验，国民党政府虽痛感群众及其党的基层组织很不完善，但此时为期已晚，只能依靠县长指挥的义勇军。

剿共军队虽占领了广阔地区，但由于共军采取了回避战

^① “上海事变”即“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同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妥协成立停战协定。后同。

术，未能歼灭其主力，而陷于停滞状态。在此期间，江西省瑞金的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政治方面、军事方面的工作顺利开展，这对蒋介石已成为国内最强大的敌人。

至1933年，日本与中国的紧张情况进一步加剧，中国国内的抗日运动更加激烈，但国共的对立却毫未减弱，相反在1933—1934年之间达到了顶峰。中共在1933年1月发表了抗日三原则，虽主张国内抗日势力有条件的合作，但抗日依然被当作反蒋的从属问题。蒋介石也于同年4月对国府要人演讲时强调主张“安内攘外”。提出只要彻底肃清中共这一“心腹之患”，则治愈日本“癬疥小病”不成问题，将抗日斗争的矛头极力转向剿共。

蒋介石第五次剿共作战，虽因日军对热河作战暂行延缓，但5月塘沽停战协定成立，对日问题告一段落，蒋立即正式进行围剿准备。此次采取了加强经济封锁、扩充汽车公路、建设包围堡垒等三大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还成立了所谓“别动队”的特务组织，负责督战，收集情报，组织群众、搞阴谋活动等工作。

为此，中共也加强了反围剿的态势。但在中共内部，最高领导权尚未确立，左翼宗派主义倾向的发生，从而削弱了中共的力量。例如，中共对11月建立的高举“反蒋抗日”旗帜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不但未与之合作，反而加以敌视。致使福建军陷于孤立，受到国府陆海空军的总攻击，于1934年1月末覆灭。

第五次剿共作战，在福建事件之后动员了近百万大军，以江西为中心，在福建、湖北、安徽等地迅速展开围剿。中

共方面采取了以正规红军为主力的单纯消耗战，因此，被剿共军的物质力量所压倒，4月末，败势已成定局。1934年7月15日，中共号召“北上抗日”，开始逐步突出江西。11月10日瑞金陷落。但在此之前，红军主力已于10月15日夜，开始大规模西迁（长征——译者）。

蒋介石鉴于共军的直接威胁业已减轻，为完成最后的剿共作战及重建濒于崩溃的经济，与日本之间有必要暂时保持休战状态。因此，1934年末开始对日采取绥靖政策。

此时，华中政情十分不稳。以何应钦为首的主张使华北统一于中央的国民政府势力，和拥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张学良系的抗日势力，推动华北五省的反蒋军阀以谋求华北独立自主的日军势力，彼此之间相互对立，各项工作针锋相对，处于一触即发之势。此时，蒋介石对日绥靖政策所提出的制止排日行动等措施尚未充分实行，而纠纷却不断发生。

1935年1月下旬，宋哲元军之一部侵入热河省丰宁县，于学忠军又于4月侵入停战区内。5月2日两名亲日要人（中国报社社长）在天津被暗杀。同月下旬，孙永勤匪团在热河停战区内扰乱治安。抓住这一机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进行强硬交涉，要求何应钦改变华北局势。中国方面被迫全面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6月10日缔结了“梅津——何应钦协定”（何梅协定）。据此协定，中国方面应实行：（一）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二）从华北撤走宪兵第三团及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治训练处，（三）撤走河北省党部，（四）于学忠属下五十一军及中央军撤出河北省，（五）解散有害日中邦交的蓝衣社及其它秘密组织，

(六) 发布禁止全国排日、排外的命令。

在察哈尔方面，自1934年末以来，由于宋哲元军对热河西部的侵犯，在张北不断发生非法逮捕和侮辱日本官宪等事件。关东军派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少将，与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交涉，于6月27日缔结了“土肥原——秦德纯协定”（秦土协定），成功地迫使国民党势力从接壤热河省西境的察哈尔省撤走。

上述两协定是为处理塘沽停战协定的善后工作而缔结的，目的是要确保停战协定的施行，其内容则又前进了一步。

华北自治工作的进展

由于上述两协定，华北问题告一段落，但这又成为下次飞跃的基础。

1935年8月，更换了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由多田骏少将到天津接任。当时奉天特务机关长是土肥原贤二少将，关东军参谋副长是板垣征四郎少将，此三人由奉天、新京、天津紧密合作，华北工作进一步飞跃发展。华北工作的意图是由中国方面有志之士成立自治政权，脱离南京束缚，将日满与华北引向亲善状态。因此，这一工作的对象，是察哈尔的宋哲元、济南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商震等华北将领。

首先开展了察哈尔的工作。8月5日在张家口缔结了“松井（源之助——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张允荣协定”，